

投奔革命

父亲眼见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败，到处抓人，两个子女受新思想影响，暗地参加进步活动，送信、贴标语，接受留法同学李嵩高的指导不易改变，留不住，留下来也保不住，最后决定“让我走”。但无路费，叫我去收“老账”100元，我去坐催10多天，收回50元。母亲和姑母东拼西凑共计60元，二妹当然支持，赠我四张手绢，我题字，她绣花作纪念，这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第一个转折点。

当时，我二伯曾北星在南京国民政府参军处吕操手下任上校服务员，我到南京只剩8元帮他做杂活，眼看他盘家养口困难，住不下去。一天在街上碰见南京学兵队的井研人，经介绍是学“防毒、救毒、制毒、施毒、消毒的”。我考进学校，这时二妹来信，已将我的20多本日记读完，写了些感想和小诗，我回信鼓励。学到一年半时，因家庭经济拮据，二妹停学了，加上包办订婚的廖继群是纨绔子弟，渴望冲破牢笼，决定解除婚约自我奋斗，要求我帮助升学。怎么办？我三晚未睡好觉，为了二妹决定改行。经我南京“战友”足球队队友的介绍，到上海锦江小餐川菜馆做杂工。别人每月七八十元，我第一个月只拿16.5元，汇了部分支持二妹就读井研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升学无望，被迫在乐山大佛寺附近小学教书，保长又吃她的工资和大米，她忍辱负重地教至抗日战争爆发。二妹性情倔强，有困难从不告诉人，还是她的朋友李树明来信告诉我说：“她患肺结核，典当了毛衣买药吃，极端困难。”我将呢大衣卖了，汇给二妹，另买一大盒阿斯比林（约一万片）给父亲，因军阀割据，地区差价大，他将药卖了，起本做生意，便赚了钱。从此二妹的学费由家庭供给，因此得考上嘉定联中（高中），但我还是在学习上竭力帮助。记

得巴金的《春》、《秋》、《家》、《新生》、《灭亡》出版，我自己读后，本本都将厚壳撕下寄给了她，还有《给女人们》、《再给女人们》等，在当时都属新书，对男女青年读之如解渴，背后传阅不已，对她影响较大。后来得知她与旧式婚约的廖继群解除了那副枷锁，走上新的前途，得我和父亲的援助，考上了川大。根据侄女曾在先回忆：“在我姑母上四川大学时，我跟随她三年（那时我大约3—6岁），她们经常有几个人在一起，只要她们在谈什么的时候，就叫我到外面去玩，他们唱《东方红》也教我唱，我唱会后并告诉我，“不要到外面去唱”。现在我还保留了一张川大毕业的学生照片，她的寝室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俱乐部。由于她组织能力强，多才多艺、曾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活报剧，多次在少城公园演出。为了活动经费，她回家闹分家，与家里人平分财产，将自己的那份遗产卖了。事后她写信告诉我“她已经成熟了，锻炼得更坚强了”。我们分道扬镳，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了。1949年末随军解放四川，至遂宁暂住，意欲回家与廷钦见面，她来信说“多少年来想念我，不但无音信，曾亲自去问过李亚群同志，李答‘在上海时见过，其余不知了’”因此认为我已经死了，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我哥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她的这封信写得较长，如解除婚约、父母之死，自己已比过去长进多了，而且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等……我也回信给二妹，准备春节回家见面，因各自工作需要，终未成行。谁料这竟是最后的一次通信。

献身革命

在1950年，我随军进驻湖北沙市，二妹到沐川高笋场任教。1952年与五通桥金粟镇伍权均结婚，婚后20多天即参加革命工作，伍调沐川教育局工作，二妹参加沐川高笋场征粮工作

队。由于她襟怀坦荡，一心为革命，深入刚解放的偏僻农村，土匪成群的地方，缺乏对敌斗争经验，当时土匪头目伍××请她吃饭，她带队参加了，未觉察土匪阴谋。事隔几天，在执行任务中被土匪包围，寡不敌众，四面无援，征粮队员一个个被绳捆索绑，受尽折磨。第二天转移，我二妹喊：“我刚参加革命，还未做一番事业，这一生就这样了结了吗？我要见见伍权钧呀！”土匪狡猾地说：“就是带你去见她。”第三天下午又带到另一地方，二妹被摧残得走不动了，土匪在草坡上挖一个土坑，凶狠地用刺刀从二妹下身刺入腹腔，血流满地，当时未死就被推下土坑。第二个是征粮队长高玉山同志又被刺死，立即投入坑内，尸体重叠尸体。土匪在恐惧慌乱中，铲几铲泥土掩盖后仓皇逃窜……妹夫在乐山开会，回来后也不知道，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被土匪杀害了。急与我来信，我痛不欲生。尔后沐川县长召开追悼会，宣布曾纹、高玉山为革命烈士，对曾纹遗体单独埋葬，国家拨款修了烈士陵园和红色高大的纪念碑，为曾纹、高玉山二位烈士塑了遗像，供人们凭吊，激励后人。我也多次带领家人扫墓留影，以慰英灵。写这篇回忆录也是对二妹的怀念和安慰。

人民的好女儿 曾纹烈士

李明梁

(一)

曾廷钦乳名清容，别名曾纹，四川井研县人。1924年农历二月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

30年代初期，井研城内有一所六译公学，办学的李嵩高曾到西欧勤工俭学。他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员，其中有共产党

员李亚群。廷钦的哥哥廷藩在这里读书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活动，并在日记里记下了活动情况。不久，这个学校的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被反动当局搜捕，曾廷藩被迫于1933年离开家乡出走到上海。廷钦细读了哥哥留在家里的日记，深受感动，从中受到启蒙教育。

12岁那年，曾廷钦考入井研中学读初中。在学校，与进步教师左泉、刘为仙、何法谦等人接近，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二年开学不久，这几位进步教师遭到逮捕，廷钦和左远芝同学受到牵连，她们都被家里软禁起来，被迫停学。

1937年经过她的多次争取，说服父母，同意她外出求学。但此时父亲赋闲在家，经济拮据，无力供给她的学费，只好求助于在上海一家川菜馆工作的哥哥。这年秋天，她考进了乐山县女中。女中毕业后，因与哥哥失去了联系，家里无法供给继续上学，才由同班同学介绍去瓦厂坝保国民学校教书。教了两个月拿不到工资，便愤然离去。

1941年，廷钦已是17岁，求学上进之心不衰，又考进了公费的江苏蚕桑学校。这所学校设在乐山城郊，设备简陋，学习空气也不浓厚，只读了一年，廷钦不愿意继续读下去。好友李树明提出主动承担廷钦学习、生活费用，同去成都。两人都考入了成中学读高中。这时物价不断上涨，她们两个人用一个人的钱，费用紧，生活苦，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读下去，这也增强了廷钦对反动统治的憎恨。

(二)

1945年下期，曾廷钦考入望江楼畔的四川大学蚕桑系。她进校的时候，正是川大进步学生运动又开始活跃之时，这对于青少年时期就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廷钦，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廷钦平时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文学。通过与农学院进步同学的接触，参加了进步学术团体川大文艺研究会（简称“文研”）。她在“文研”中，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李何林著《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等进步的文艺理论，阅读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文艺作品。她还向报刊投寄稿件，有时也在《半月文艺》壁报上写点东西。同时，“文研”和其他进步学术团体，如“时事研讨社”、“文学笔会”、“自然科学研究社”、“女声社”、“自由读书会”、“旭光学术社”、“离离草社”等一样，在川大党组织和“民协”的领导下，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文研”成员曾廷钦积极投入进步学生运动的洪流，不断在斗争中努力提高自己。1947年到1948年春的助学运动中，廷钦被编入以“文研”会员为主的助学队，从大年初一起，到南郊武侯祠一带开展宣传讲演和义卖活动，以后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都在城内进行义卖、义演和劝募活动。在少城“公馆区”深入街巷逐户宣传，义卖助学家、助学报、助学春联、助学贺年片等。同学们整天在外奔波，口干舌燥，腰酸腿痛，饿了，自己掏钱买点锅魁充饥，口渴了，喝点凉水，一点也不觉得苦，还歌声不断。这时大家看见廷钦身体瘦弱，又很疲惫，虽然精神不减，但总不能与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年轻姑娘比，大家劝她休息，她却坚持要和大家战斗，不要什么照顾。由于她能够勤学习，勤交友，勤工作，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48年春，被吸收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协”。这是廷钦政治生命的一次飞跃。

（三）

1948年的“四·九血案”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爪牙王陵基，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蒋家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受到威胁。国民党反动当局迫不及待地加紧了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镇压，先是在反动报纸

上公布所谓涉嫌共产党的名单，继而实行大逮捕，设特刑庭。已经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进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上级党组织关于“隐蔽精干，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对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民协”会员设法撤离到外地去工作，尚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留校工作和斗争。廷钦由于未暴露，就继续留在学校。这时，她在校参加学习世界语的活动中，结识了为人诚朴的化学系男同学伍权钧。老伍是川大进步学术团体“自然科学研究社”的成员，他们在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9年春天，伍权钧回到沐川县高笋乡工作，廷钦已临近大学毕业。夏天，川大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再次有计划地转移一部分党员和“民协”会员到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廷钦被组织派到沐川马边河据点去工作，以高笋乡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职业。不久，即和在高笋乡工作的伍权钧结为革命伴侣。

1949年9月，“民协”在沐川舟坝师范建立了干事会，廷钦是高笋地区的“民协”联系人。她勤恳踏实地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她经过群众工作实践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觉悟，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廷钦既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她和伍权钧尽管是夫妻，互相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他们经常一道学习，分析形势和情况，研究革命工作方法。但从不涉及各自组织方面的问题，彼此却能配合默契。

1949年10月，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在沐川马边河一带着手组织革命武装，以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截击国民党军队溃逃残部，并争取实现马边河地区的和平解放，保证地方安全，防止地方恶霸乘机作乱，防止国民党残余的散兵游勇溃散潜藏。廷钦积极参加了革命武装的准备工作，并于12月初从高笋乡来到革命武装——“川西南军区游击队”所在地舟坝师范学校，参加了党员大会和革命武装的成立大会，被分配在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并随川西南军区

的十纵队去大渡河配合解放军十八军追击宋希濂残部。12月中旬，解放军三十师派司令部作战股长带一支小分队来到舟坝，在与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会师以后，共同按地委指示精神作出安排，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人员大部分去三十师，一部分人转入地方工作。12月下旬，廷钦随一部分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去沐川县城向县委报到。根据她的身体情况，县委领导本来要把她留在县城做机关工作，但她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县委根据她的要求，分配到四区征粮工作队，和队长高静培同志一起，到高笋乡做群众工作。

春节过后，征粮工作亟须开展，而高笋乡的恶霸、匪首尹乐尧、胡安品等图谋暴乱亦日见端倪，气氛日趋紧张。这时，沐川县委书记杨波凌同志到四区检查工作，去高笋乡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由于队长高静培去一个较远的村子工作未回，杨波凌同志在心怀叵测的匪首尹乐尧离开工作队住地后，立即对留在队部的曾廷钦说，这里的情况可能有异常变化，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事态的发展变化，并要与县、区取得联系。高静培回到工作队部后，曾廷钦即给他传达了县委的指示。老高也从他了解的蛛丝马迹中，感到事态很严重。工作队认真地对当时的紧急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研究，决定一方面在日益严重的形势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敌人要提高警惕，但不能惊慌失措；同时继续做好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稳住上层的工作，争取征粮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派人分赴县、区汇报高笋乡的情况。不料，敌人已对县、区通道实行封锁，消息无法传递，送信的人亦遭不测。与此同时，县委十万火急地派专人通知他们秘密撤退的紧急指示信，也未能送到。高笋乡工作队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敌人在伺机蠢动。2月中旬的一天，工作队在高笋小学召开征粮工作动员大会，恶霸、匪首尹乐尧、胡安品等也来到会场，暗地里，他们已经布置匪徒把高笋小学周围和各个场口包围起来了。大会刚开

始不久，胡安品突然下令把工作队的几个同志捆绑起来拖到场口外面的土坑前面，先下毒手把工作队中的两个南下的同志杀害了丢在坑里。接着，又对曾廷钦和高静培施行威胁利诱，妄图使廷钦等屈服。廷钦他们义正辞严地斥责匪徒们的罪行和痴心妄想，要他们向人民缴械投降。面对坚强的共产党员，匪徒们无计可施，终于疯狂地下了毒手，将曾廷钦、高静培残暴地杀害在场口，弃尸坑内。廷钦牺牲时年仅26岁。后来，沐川县人民政府追认她和同时牺牲的几位同志为革命烈士。她的家乡井研县人民也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她。她的母校——四川大学把这个忠诚的女儿的名字铸上了矗立在校园的烈士纪念碑。前年，沐川新建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廷钦的英雄形象跃然於《魂系中华》的烈士纪念碑上。

附录：

渔 家 傲

怀念曾廷钦同志

李明梁

山乡春寒景色异，石堰料峭无去意。
幢幢鬼影悄然起，尘雾哀，慷慨悲歌英烈去。
六译先驱启蒙始，朋侪皆因解放计。
平顶山下话真谛，每聚会，总是追思岁复岁。

文幼章魂归大渡河

魏奕雄

1994年4月18日是乐山人民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博士的骨灰，撒在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大渡河里。

文幼章原名詹姆斯·安迪考特，1898年12月24日出生于乐山市白塔街一所教会人员住宅里，6岁时离开乐山。1993年11月27日因心脏和肺衰竭，溘然长逝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圣克莱尔寓所。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正积极准备隆重庆祝他的95岁诞辰，这项表达中国人民对他的深深敬意的活动，只好遗憾地停止筹备。

文幼章临终前念念不忘他的出生地乐山，嘱咐家人要把骨灰撒在乐山，以圆他重返乐山之梦。

1994年4月中旬，文幼章的继室埃拉夫人（76岁）、儿子文忠志（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62岁）、女婿苏维廉（多伦多多市加中友好协会主席，67岁），护送文幼章的部分骨灰到北京。4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联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文幼章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朱良、加拿大驻华大使碧福等出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黄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许群等在会上讲了话。

4月15日，埃拉一行到达成都。当晚，四川省副省长蒲海清